

# 顾颉刚毁信，辜负挚友托付

史学大师顾颉刚心中有一道坎始终过不去，他曾做过一件事令他万分惭愧的事，直到许多年之后，他公开了这个秘密后，才算慢慢释怀。

在辛亥革命时期，有一个由民国政客江亢虎创立的中国社会党，宗旨是倡导“教育平等，遗产归公”，目的是消灭阶级。后来创始人江亢虎到苏州做演讲，当时正在上中学的顾颉刚听后感觉这个党很先进，就签名加入了中国社会党。此后，江亢虎派中国社会党领导人之一的陈翼龙任新成立的中国社会党苏州支部总务干事，陈翼龙就安排顾颉刚做文书干事，他们相处得很好。

1912年，顾颉刚从中学毕业时，陈翼龙已经调任北京支部主

任干事。顾颉刚瞒着家里人逃到北京，并跟陈翼龙到天津筹设支部。顾颉刚的父亲发现他逃走，立即赶来淌着眼泪对他说：“我只有你一个儿子，我绝不能让你办党。你中学毕业，正好考大学，北京大学就在这里，你可报名应考。如能考取，我也不强迫你脱党，只望你好好读书，不担任党中职务即是。”顾颉刚被父子之情所感染，只得点头答应。过两个月，顾颉刚考上了北大预科生。此后，忙着上学的顾颉刚更少到党支部参加活动。

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幕后凶手指向袁世凯，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陈翼龙是个血性汉子，他便到上海，同国民党中主张讨袁的人联络，准备从北京起

义，响应南方的二次革命。顾颉刚虽然不经常和陈翼龙见面，但陈翼龙还是把顾颉刚看作他的亲信人。

有一次，顾颉刚去见陈翼龙时，陈理好了一网篮信件，交付与顾颉刚，说：“我想造反，但袁贼势力大，我斗不过他，十分之九要牺牲，这些信札都是我和革命派往来的密件。现在交给你，希望你把它安置在北大。等我死了，你可把它整理出来，写一本书，待袁贼失败后印出，留一点革命的史料。”顾颉刚明知他凶多吉少，还是欣然接受了，当时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此事。

这年八月，陈翼龙回到北京还没发动起义，就被逮捕，送至军政执法处，袁世凯政府大张旗

鼓贴出了三天的告示，将他杀害。袁政府随即通电全国查禁“社会党”，全国社会党的总、支各部都解散了。

袁世凯为了彻底消灭他所谓的乱党，命令侦缉队到各机关、学校逐一搜查。风声越来越紧，顾颉刚趁半夜人都睡着了，把一网篮的信札分别投到了两个井里，把这个烫手山芋给销毁了。

年轻的顾颉刚因为一时害怕而做出的这一举动，不仅使这一批珍贵的革命史料失传，更主要的是他辜负了陈翼龙的嘱托。可见大师也有凡人一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顾颉刚能揭开这个无人知晓的秘密，即已经说明他的善良、坦诚和追悔。

据《团结报》

## 赫鲁晓夫醉后演讲 翻译巧妙应对



1956年4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对英国进行了首次访问。两位领导人是乘坐当时苏联海军最现代化的舰艇“奥尔忠尼启则”号巡洋舰抵达英国的。

在此次访问过程中，赫鲁晓夫访问了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在与英国实业界精英进行的一次重要会晤中，轮到赫鲁晓夫发言时，在酒精的驱使下，他将口袋中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稿抛到了脑后，开始即兴发言。他说着说着，很快忘记了发言对象是谁，开始用他一贯的风格讲话。后来竟说：“我们一定要把你们埋葬！”接着，又开始抨击世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这一番即兴讲话之后，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停顿。时任赫鲁晓夫翻译的特罗扬诺夫斯基脸色发白，额头冒汗。赫鲁晓夫捅了他一下，嘟囔道：“快译！”

特罗扬诺夫斯基开始翻译。但他翻译的不是赫鲁晓夫的现场讲话，而是正式文本的内容。赫鲁晓夫继续滔滔不绝地骂，特罗扬诺夫斯基仍照正式文本的内容进行翻译。赫鲁晓夫的话被“翻译”之后引得场内气氛活跃起来，与会者对呼吁加强合作表示赞许，某些讲话还赢得经久不息的掌声。

赫鲁晓夫结束了充满激情的讲话，对自己的表现极为满意，在与与会者暴风雨般的掌声中离开了大厅。

赫鲁晓夫终于睡醒了，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好像说了些不妥的话？”问特罗扬诺夫斯基，“你都如实翻译了吗？”赫鲁晓夫问特罗扬诺夫斯基。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是按事先拟定的文本翻译的。”特罗扬诺夫斯基声音颤抖地答道。

“你真聪明！”赫鲁晓夫高声夸奖道，然后竟同特罗扬诺夫斯基热烈拥抱，并亲吻了他。

以后，特罗扬诺夫斯基获得了赫鲁晓夫的青睐，其外交仕途一帆风顺。据《文史博览》

## 王资愚、黄侃用真情诠释诗文

著名律师张思之先生回忆他的初中国文老师王资愚：王老师在课堂上朗读“大江东去”，“醉里挑灯看剑”，声情并茂；讲到李煜的“故国不堪回首……”则是语含呜咽地对学生说：“国不可亡，决不能亡；否则，月明不再，山河也就变色了。”然后说：“李煜词绝佳，可读，但决不能当李后主！”这是在抗战时期，王老师的话一字字打进少年张思之的心底，影响了他一生。

国学大师黄侃晚年讲课，没有一定的教学方案，而是兴之所至，随意发挥，并且上课的内容也没有完全从学术角度着眼，而是经常借古讽今，批评时政，针砭时弊。1935年，在金陵大学一间教室里，黄侃给学生

讲《诗经》，当他用独特而极具感染力的“黄调”念完末章“牂羊坟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鲜可以饱”之后，又把《毛传》“牂羊坟首，言无是道也。三星在罍，言不可久也”，用非常低沉、几乎是哀伤的声音念了出来。念完，黄侃没有对经文和传文做过多的解说，但青年学生们的心弦却深深地被触动了。黄侃讲完课，在下课铃声中，抱起他的黑布书包，走出教室，四天后便在忧愤中逝世了。

王资愚和黄侃两位先生，他们的课堂没有机械单一的知识传授，却充满着个人独特的体验、真挚的情感。这样的课堂，是“人”的课堂；这样的课堂，令人不胜回想。

据《中国教育报》

## “香烟事件”使宋美龄在美国形象大跌

宋美龄于1943年1月初带着随从人员和孔家的两个外甥搬到白宫居住。她总是喜欢在房间里用餐而不去餐厅。尽管每个房间都安装有电铃和电话，但是宋美龄却总是喜欢用拍手和大声叫唤的方式来呼叫白宫服务人员，这让他们感到非常恼火。

宋美龄住在纽约华道夫饭店时，联邦特工人员只能在她外出以后才能去清扫电梯及走廊，还要征得宋的随从的同意之后，才能打扫她的房间。但是后来，宋美龄经常随意改变行程安排，甚至干脆取消外出行程留在酒店里，这给联邦特工人员的工作带来了极大不便。特工人员的头头曾经希望宋美龄固定她的行程安排不要随意更改，她就立刻要求把这个人调走。孔家的两个外甥外甥女虽然没有宋美龄那么大的架子和特权，但其傲慢和高高在上的态度也同样令美方人员感到厌恶。

1943年2月底的一天，宋美龄对白宫接待处负责人说，希望美国财政部和纽约海关免征一批英国特制香烟的关税，

因为那批香烟是她订的。美国人照办了。但随后不久，由于德国潜艇的威胁，运送这批香烟的轮船比预定时间晚到了几天。就在这批香烟还未装卸下船的时候，宋美龄的随从人员不断打电话催促白官方面，要求将香烟立即送到宋美龄的住处，白官接待处被这一整天没有间断过的催促电话搞得不胜其烦，只得命令财政部派专人“把香烟立即卸卸下用飞机送到华盛顿。”这件事情被媒体报道出来以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

在前不久还对宋美龄大加赞扬的《华盛顿邮报》不无讥讽地说：“这个国家的人民还在饿着肚子抗击敌人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夫人却在万里之外的美国享用着飞机运来的免税香烟。”“蒋夫人的行为没有表现出她想引导她的国家走向民主前路的意愿。”“总统此时，……只想让她尽快离开美国。”

据《中华史林》



## 胡适放窗帘 吴宓搬椅子

上世纪30年代，北大名师荟萃，各怀绝技。时任文学院院长胡适，尤其受学生喜欢。他上课别具风格：深入浅出，条理明晰，偶尔穿插一两句恰到好处的俏皮话，让学生身心放松，如沐春风。有时，课安排在下午，教室里有太阳西晒，胡适经常自动走下讲坛，放下窗帘，并说：女同学们是不应该多晒太阳的！

在民国教授群体中，还有一位特别懂得“怜香惜玉”的人物——国学大师吴宓。吴宓在西南联大是西语系的教授，他

开的“红楼梦”课非常“叫座”，听课者如云，尤以女粉丝为多。有一回，吴宓走进教室，看到有些女生站着，马上转身而出，咚咚咚去隔壁教室搬椅子。联大教室的椅子是可以搬来搬去的。吴宓这一骑士行为，惊醒了听课的男生们，大家急忙起身，蜂拥出门去搬椅子。等到所有女生都坐定，吴宓才开课。吴宓的学生汪曾祺风趣地说吴宓的行动，很能体现“贾宝玉精神”。我想，如果少了“贾宝玉精神”，吴宓的“红楼梦”课大概会少了许多魅力吧。

据《中国教育报》

## 李叔同批评学生后鞠躬

一个世纪前李叔同给丰子恺等学生上音乐课，课还没开始上，李先生就端坐在讲台上。坐到上课铃响起，他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这样地上课，空气严肃得很。

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吐痰在地板上，以为李先生看不见的，其实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责备，等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这位同学只得站着。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位同学和气地说：

“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罢。”出来的人大都脸上发红。又有一次下音乐课，最后出去的人无心把门一拉，碰得太重，发出很大的声音。他走了数十步之后，李先生走出门来，满面和气地叫他回来。等他到了，李先生又叫他进教室来。进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向他和气地说：“下次走出教室，轻轻地关门。”就对他一鞠躬，送他出门，自己轻轻地把门关了。

据《中国教育报》

## 郁达夫隐姓埋名办酒厂

在20世纪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亚洲国家的时候，郁达夫曾避难于印尼苏门答腊，还在那里办过一家酒厂，买卖做得很不错。

1937年，郁达夫先是到武汉配合郭沫若的工作，随后进入新加坡《星洲日报》进行抗战宣传。在这期间，残酷的战争让他富阳的家业毁于一旦，70多岁的母亲为躲避战乱饿死在山间，长兄郁曼陀在上海惨遭汉奸特务的杀害，爱妻王映霞也因战争离他而去，3万多册心爱的藏书也在战火中丢失。

随着战争的进一步蔓延，郁

达夫被迫弃文从商，走上办厂经商之路。1942年新加坡沦陷，为避开日本侵略军的烧杀抢掠，郁达夫一行逃离狮城，辗转进入印尼苏门答腊的一个小镇。缘于生计所迫，郁达夫改名易姓为赵廉，向当地华侨募集400盾资金，办起了“赵豫记”酒厂。这对郁达夫来说，无疑是一场考验。天无绝人之路，幸得当地华侨许乃昌帮助，他终于酿造出两种白酒，即“双清”和“初恋”，两个品牌在市场销售，卖得很好。从此，他重新成家立业，续娶广东华侨陈莲有为妻，再生一男一女，家

有盈余。据他1945年所立的遗嘱记载：“统计目前现金，存两万盾；家中财产，值三万盾。丹戎宝有住宅草舍一及地一方，长百二十五米，共一万四千盾。”“纸厂及齐家坡股款等，因未定，故不算。”可见，此时郁达夫也可算家境不错了。

遗憾的是，尽管他隐姓埋名，妻子陈莲有也改名为何丽有，最终日本宪兵还是通过间谍机构查清了这个“赵豫记”酒厂老板的真实身份。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惨遭日本宪兵的秘密杀害。据《过去的那些教授》